“洒扫庭除”议

宋 犖

上世纪30年代上小学，老师教背朱子家训，即清初朱柏庐（1627-1698）的《治家格言》：“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洒水扫院子、走廊、室内外地面，用笤帚或鸡毛掸子拂拭桌椅床榻上的尘埃。后来看到南宋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的《大学章句·序》中有言：“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早在西汉宣帝时代（前74-前48），戴德、戴圣叔侄所编《礼记》被列为五经之一，“洒扫厅堂、喷水扫地”定为社会生活规范，成为儒家教育的经典国粹。西汉后，洒扫庭堂逐渐提升为经典礼仪。战国时代达官贵人出游，地方官民清宫除道，洒扫街衢以示敬仰（《战国策·秦策一》）。清明节扫墓成为祭祖仪式。东汉高官、诗赋名家冯衍被罢官后“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官不做了，也不扫除了。南宋陆放翁（1125-1210）有诗句“南台中丞扫榻见，北门学士倒屣迎”。近代民主革命家、国学大师章炳麟（1869-1936）在《致伯中书》中有句：“君以暇时能来相就，则扫榻以待也”，以扫拂竹榻灰尘待客。《三国演义》中写马谡失街亭后，司马懿大军攻西城，诸葛亮无兵可用，大开城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故作镇定，到城楼上抚琴，以迎司马氏进城，后者恐中计而退兵。洒扫既是礼仪，又成为用兵之计。

读中国历史，从黄帝到清末，威胁中国人生存的常是瘟疫、灾荒、战乱。饥荒、贫困是第一杀手，饿殍遍野，司空见惯。爱久传祖训是民以食为天，不饿死是第一要务。危殆时，糠、菜、树皮、树叶、煤炭、白土都成了代食品，遑论洁净与否。“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之类傻话千年流传。

中国北方干旱缺水，是广大农村缺少洗澡习惯的原因之一。北方人二戴所编《礼记·内则》规定：五日洗澡，三天洗头，随时洗脸，足垢了洗脚。这是对君王、士大夫的要求。对市井坊间，只建议初生儿“洗三”、四月初八“浴佛”、端午节“洗身”、过年要洗澡，一年洗四次。传说高原缺水处，有人一生只洗三次澡。

欧洲人的卫生习俗与中国完全不同。14世纪，欧洲因耶尔森氏病菌传染，鼠疫大流行，俗称为黑死病，两年内欧洲死亡2500万人，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664—1665年，伦敦鼠疫再发，46万人口中死亡7万。1918年，欧洲又有流感大暴发。数月内，欧洲死亡2000万人，3亿人被病毒感染。这几次传染病大流行使欧洲人心惊胆战，谈虎色变，如临世界末日。恐怖的疫情故事，世代流传于坊间。教会、政府和民间大力推动改善卫生习俗，防止瘟疫传播。保持住宅卫生和每周洗澡，遂成欧洲城乡居民的生活习惯。

20世纪50年代初，不佞被派往哈尔滨工业大学就读。彼时哈尔滨有数十万俄侨，市内充满欧式建筑。哈工大的前身就是1920年代成立的哈尔滨中俄工业学校。学校教室位于大直街与教化街交叉处一座木结构小楼里。负责打扫卫生的是一组俄侨妇妪。内地新招农村学员，鞋粘雪泥脏土，常把走廊、教室的木料地板涂成泥沼。俄大妈们每天赤足挽袖，手提水桶，双膝跪地洗擦地板，清水漂洗，搓刮污垢，寸地不漏，汗流浃背。第二天上课，地板走廊、门窗内外，清洁无疵，室内窗明几净如新。她们从早到晚打扫厕所，使之从无异味。农村来的同学感到震惊，即使从上海来的也惊讶不已。半年后不知何故，俄大妈们走了，换成中国妇媪打扫卫生，改用祖传故伎，洒扫走廊地板，不久都变成永久泥地，厕所故臭逸扬，人人感叹不已。

数年后，我在莫斯科去同学、教师家做客，无论市内公寓、郊区小镇、乡间旧棚，室内都很洁净，墙角、窗台、厨房、洗漱间一尘不染。进门必须换鞋、脱大衣。主妇每周日至少花半天洗地板、擦门窗，清理卫生，一丝不苟。苟有发现不到位处，家长，通常是丈夫谑斥：“为什么你妈没教会你打扫卫生？回家重学去！”2003年，我随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古巴，一位叫尼娜的女士为我们做翻译。她在北大学过中文，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猜想她是西班牙人的后代，因为古巴人口由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混血（Mestizos）、西班牙人和非洲人混血（Mulattos）组成。有一次，她来迟了几分钟，笑着解释说：“今天是礼拜天，我必须赶早起来洗刷地板，擦净门窗桌椅、厨房和卫生间，否则，丈夫就不要我了。”可见，女孩子从小要学会维持室内卫生是欧洲各国的祖训习俗。

欧洲城市的公共场所，如剧院、影厅、会堂等，都设有更衣室，入厅者必须脱存大衣、雨衣等才允许入座，防止疾病传染。

每星期必须洗澡也是欧洲人的生存固智。乡镇、兵营、牢狱等必设澡堂。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家庭洗浴尚未普及，城镇公共澡堂林立，偏僻乡村居民点必有公共浴室，分日向男女开放。

闻民间传说，欧洲的卫生习俗源自于《圣经》。《旧约·利未记，章14》中提示民众保持卫生，防止瘟疫，每周洗澡，擦洗地板，洗涤庭厨，换洗衣裳，室内无灰尘，地上无污渍，墙角无秽垢。

现代医学的卫生学确认，环境是影响人类健康生存的关键条件。人的血液中60多种元素含量都与环境（食物、空气）相关。人间80%的发病率和90%的死亡率与环境卫生有关（仲来福主编《卫生学》）。婴儿死亡率和死胎有40%与环境中细菌病毒污染所导致的呼吸道感染窒息有关（《自然通讯》2022年11月）。很多发达国家政府卫生部门对工厂、会堂、学校、饭店、公寓等公共场所制定了卫生规范，以减低环境污染导致的流行病传播。

1952年，毛主席、党中央号召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城乡居民的环境卫生有很大改善，消灭和严控了天花、脊髓灰质炎、鼠疫、麻风、脑膜炎、血吸虫病等恶性传染病。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全面脱贫，美化生态环境，保护大气、水源卫生，实施厕所革命等重大工程，进一步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婴儿死亡率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200‰降到5‰以下，期望寿命提高到76岁以上，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东亚病夫”时代已成历史。

但是，据笔者观察，尽管社会生活环境不断改善，“洒扫庭除”的千年传统仍然顽强坚守，可谓习久成性，古俗难移。很多居室已换成木质地板，精密仪器车间已改成磨光水泥地板，仍然“洒扫”而非“擦洗”，墙角旮旯任其污垢积累，细菌病毒丛生。2002年的非典型性急性肺炎（SARS）和2019年暴发并至今仍在肆虐的新冠病毒（COVID-19），世界各国感染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扰乱了社会生活，学校停课，街道封闭，交通阻滞，经济下滑，教训深刻沉痛。窃以为政府卫生部门应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社会卫生规范，像国际公认的《优良制造规范》（GMP，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制造精密机械、微电子器件的工厂、车间对环境卫生条件规定了可测验的定量标准，每立方米空气中灰尘等污染物微粒含量不许超过标定值——100级～300级净室）那样的定量的细则，有助于人工智能卫生机器人的研制和完善，更有利于移风易俗，形成科学的卫生习俗，以建设拥有优美环境的现代社会主义国家。

2024年3月18日写于中国工程院

『文汇笔会』微信公众号

追忆姜德明叔叔

臧小平

记得去年5月27日，从老友雪村的朋友圈里得知姜德明叔叔前一天上午驾鹤远行的消息时，正值我从医院输液归来。躺在床上连说话都没有力气的我，脑海里却是翻江倒海，排浪击岸。初闻噩耗的悲痛，使多少年来的往事带着岁月沉淀后的亲切、鲜活和我心底的钦敬、感激，桩桩件件在眼前，在心头，明亮而清晰。

姜德明叔叔是著名的藏书家、散文家和编辑家，1929年出生于天津，1951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即进入人民日报从事编辑工作，后担任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直至退休。叔叔是我父亲臧克家的老朋友。他们结识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第一次见面是源于叔叔的登门取稿。可能是由于叔叔当时落脚在东总布胡同东面的人民日报宿舍，距我家所住的建国门内笔管胡同8号的出版总署宿舍咫尺之遥，因此他又被我父亲称为“好邻居”。从此书信往还、欢聚畅谈长达五十载，成为父亲信中形容的“没有一点矛盾，只有友情，这是难得的，值得珍重、珍惜”的友人。

父亲和德明叔叔都是山东人。父亲长叔叔24岁，因此说他们是忘年交也不为过。叔叔读中学时，我父亲已有诗集问世。尚是中学生的叔叔在天津天祥商场二楼旧书摊买到了父亲的第一本诗集《烙印》，非常喜欢。此后欲罢不能，到处找寻父亲别的集子，一直买到星群出版公司的《泥土的歌》（方型本）以及“森林诗丛”……在《文艺春秋》上，他第一次见到了我父亲的西装半身照。这些记忆一直清晰地保留到他的晚年。叔叔曾在1990年9月2日的来信中充满情感地写道：

我当时即感到你是一位泥土诗人，热情的诗人，不老的诗人。我从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包括勤奋和永远不满足。

由于叔叔接触和搜集到的现代文学作品很广泛，因此对我父亲早期的文学创作有较全面的了解，对于人们不太熟知的我父亲的小说创作，他曾几次在信里提到：“……还有小说，我原以为皆写于抗战和胜利之后，近始弄清战前已有小说发表，是我少见了。”对于我父亲这位诗人的小说创作的关注，这在一般读者和朋友里，还是很少见的。

叔叔对父亲的散文更是有所偏爱：

近来连续读你的佳作，从闻一多到老舍，从主席的诗词，到给香港文汇报的纪念文章……我都一一细读了。我忽然有个联想，就像我在抗战胜利后在中学读你连续发表的小说一样，那时你不仅写诗，也是一个小说家；现在呢？既写诗，又是一个散文家了！那时是“小说热”，现在是不是“散文热”呢？愿你这“散文热”也传染到《战地》来，我等着你的新稿。记得当面也曾对你说过，写陈老总的那篇也是很好的，上海文艺那篇也好……这样说来，似乎我更喜欢你的散文了。诗人臧克家听了可能要不太高兴了吧？一笑。

父亲在1992年3月21日的回信中立即做了回应：

近些年，散文兴盛起来了，这是好事。散文，有学术的，叙述性的，抒情性的，各自不同。……散文也要精美，不能散散漫漫，松松垮垮。说到我自己，这些年，我写散文甚多，诗产则大少。我以散文抒写诗情，要求：含蓄、隽永，以细节表现人物情态及性格。不论写什么，须得对所写的积得厚，在心中酝酿久久，感情来时，然后下笔，使文章有点个人风采，最不喜欢一般化。总之，我写散文，第一要注意它的现实性（写人物，写有关人民生活的事件……）。有时写点风景，但其中也含有思想性。再就是它的抒情性。第三注意文字的精炼，质朴，真实，叫读者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我写散文，不少是揭露不合理现象的，替“寒士”抱不平，替人民说话，笔锋尖锐，带有真实的浓情。

父亲信末又“再补一句：任何文艺作品，脱离时代，去人民太远，不会有大成就的。小说，诗，如此。散文，也如此”。

父亲的这封信概要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散文观。同为散文家的叔叔深以为然。

德明叔叔喜爱父亲的作品，父亲对他的创作也同样关注和欣赏。叔叔的散文集《相思一片》问世不久，父亲在1987年7月4日下午的去信中，谈了他的感受：

暑天，读“情思”（注：指《相思一片》），何只一片？我与黎丁，1942年就书信来往了。北京三十几年来，过从可谓“密”矣，但，他的两本著作并未见到，连书名也茫然。读了你的文章，不仅觉得亲切有味，对他更加亲热，更加敬佩了。你所写人物，我大半熟悉，故而读来分外亲切。你的文笔，娓娓动我。

仅过了两天，父亲又写道：

昨发一函，今天又读了“相思”三片。你，文笔舒缓，亲切，令我爱读。你忠于你的感受，不作假，不夸张，但纪事却有情。……你，写得好，能吸引我。我，一年收到百本以上赠书，十九置之高阁，而你的，却亲在床头，不时翻阅，有味成趣。再读时，再写上三短函。

父亲因精力不济，不能逐一拜读朋友赠书，但对于叔叔的确是“另眼相待”。打开我们珍存至今的叔叔的散文集《书叶集》，在这本1981年出版的266页的集子中，父亲几乎在每页都圈圈点点地标注了许多文字和符号，并且在书页间夹了数十个小条提示重点。这种情况在父亲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他在此书扉页里夹的一张纸上写的几句话，凸显出父亲对于叔叔这本集子的重视和喜爱：

我爱其短，喜其细，不着议论，多记人所不知或不注意的小事。好似野草小花，自有特殊情趣，赏心而悦目。克家、81、7、14日

在多有夸赞的同时，依照父亲的性格，即使是老友的作品，他也不一味说“好”。在关于《相思一片》的通信中，父亲就曾直言不讳：“我想，如果你能用再少的文句，给你熟知的人物‘传神’，一定另有一种情趣，如同《世说新语》一样。”叔叔则在1987年7月8日的回复中说：“您的指点，正中要害，我今后要学着‘用更少的文句’来写文章。只有老朋友才肯于这样直爽地提出批评，我很感谢。我虽然已经注意写文章不要把话说尽，还是功夫不到家。删别人的稿子也许还大胆，自己的有时就舍不得了。可笑，却又是实情。”在这对老友的往还书信里，包含了多少东西！

父亲待人热情如火，对朋友们大多有求必应，更不用说被父亲称为“你我老友，有命必从”的德明叔叔了。据我所知，他曾为求书若渴的叔叔专函亦师亦友的前辈王统照先生之公子王立诚先生，问询德明叔叔找寻不见的统照先生早年自印书《这时代》和《题石集》的下落（从中我感悟到叔叔对于藏书的执着和其中的不易）；也曾应叔叔之请，向朋友打探1937年前即遭日本宪兵杀害的爱国青年诗人邵冠祥的情况（我父亲曾为邵的第一本诗集《风沙集》作序并题写书名）。叔叔在1980年代发表于《读书》杂志的《津门书话》里也谈到了这件往事。这就是老一代人的友情，他们的交往常常穿插于不同时代漫长时光的因缘际会之中，很多故事真是说来话长啊！记得德明叔叔在某年2月5日的来信中说：“画家韩羽，山东夏津人（我是高唐），为我画了一幅《起解图》。他的设想是：差公崇公道是个好心的老头儿。他同情无辜受屈的苏三。途中，他将苏三的枷摘下替她拿着，又把自用的拐杖交给苏三使用。所以这个小女子边走边回首，以感激的眼神望着这位老人……我很喜欢这小画，因想，如能得到您的题句则更为珍贵。今冒昧以求，希拨冗赐书，不胜感谢！”父亲同样也为画中两人的传神情态所打动，一番推敲后，两行妙句跃然纸上：“世路孤行伤心冷，人间回首感情温。”短短14个字，浓缩、包涵了多少内容！词与画神韵契合，相映成趣，不仅叔叔和画的作者由衷地赞叹和感谢，更令我们全家喜爱玩味到今天。

得识叔叔多年，我对他很是钦敬和尊重，因此他每次来我家看望父亲，我只要在家，一定到客厅作陪，这样，我就可以从叔叔口中得知不少有关文学方面的新闻和旧事，听来真是饶有兴致。再加上我与叔叔的公子姜旗同龄并相识，就又多了些话题和几分亲近感。而令我记忆和感触最深的，是这样两件事。

2000年初春，为了编辑父亲的全集，我带病分门别类地整理了他特意保存多年的朋友们的信件，从中发现了一封德明叔叔写于多年前的短信，专门寄来了一篇发表于香港报纸、作者署名施宁的文章《听臧克家的朗诵》：

那是四十年代，在青山达德学院民主礼堂上，听过一次嘹亮而又动人的声音：就是诗人臧克家的演讲与朗诵。

这个清瘦而又带着北方口语的诗人，在演讲时，虽然使我这个广东人不易听得懂，但他那种手舞足蹈的激动表情，实在令我十分兴奋。我听见他说他很高兴地望着座上的许多年轻人而感到自豪。

当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话语结束了，全场流动着一阵热烈的掌声。随之侧坐在讲场前面的黄药眠先生站起来说话：“相信一定有些人听不懂臧先生的讲话，我来翻译一下吧。刚才臧先生的演讲题目是《闻一多先生的道路》。”

话刚说完，臧先生转身想走回座位去，跟着又是一阵掌声，听到有人在高呼：“请臧先生来一次朗诵。”

他微笑地摇一摇手，但为了大家的热情，终于又拿起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首闻一多的遗作《一句话》，跟着又高声朗诵起来：“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的着火！……”一边放声朗诵，一边不停地顿着脚，像狮子怒吼一样地激动着。

快要完毕了，突然又一次呼声：“再来一次！”

真令我感动了，这是诗人臧克家的朗诵。

1981年8月22日，叔叔又专函寄来了香港《新晚报》刊发的父亲与钟敬文、黄药眠、周钢鸣和端木蕻良诸先生，1948年冬在香港青山达德学院的合影，并附言：“读港报，见一图片，以为少见，特剪下奉呈留存。”

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叔叔！他广纳博览又古道热肠，经常把新发现的有关朋友们的资料和信息尽快地告知对方，让友人们眼前一亮，收获匪浅！我父亲就是受益者之一，我也随之沾光。且不说当年老人家看到这篇文章有多么惊喜，叔叔的这个举荐也使我知晓了父亲1948年底避难香港的这件往事。这是一篇多么精彩的短章！全篇洋溢着一股激情，短短500字，却将半个多世纪前父亲在达德学院礼堂为爱国学子激情讲演的情、景、神态和氛围，描绘得惟妙惟肖又淋漓尽致，使人犹如置身其中。我被这穿越时空扑面而来的旧事深深打动，按捺不住灵感一口气写下了散文《感悟父亲臧克家》。因为，从父亲的人生经历和毕生追求中，我深深明了他何以在大病初愈之时，能够在讲演中发出狮子般的吼声；他何以会用掺加了自己强烈爱憎的语言，去讲述他的恩师闻一多先生的爱憎与人生：他是在用生命的呐喊，再一次为后来的知识青年们，指明那条血染的争取光明解放的路——这是闻一多先生和万万千千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我至今都感念叔叔，他热心地邮寄过来的这篇文章，使我更加了解了我的父亲。

《感悟父亲臧克家》发表后，我心存感激地将文章寄给了德明叔叔。不久，他在回信中写道：

小平：

你好。节前未去取信，节后才去，复信迟了，请你原谅。

早就知道你病的情况，也常打听，衷心地祝你能早日康复，希望你乐观地坚持下去。你不能照顾二老，大家都能理解，千万不要责备自己。

复印的文章写得很好，内容很重要，应该写。这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对人们认识克家先生很有帮助。谢谢你寄我一份。

姜旗的女儿今年在美上大学，他们夫妇要回来工作。儿媳已先回来了。

顺问

全家好！

姜德明2001.10.11

叔叔在字里行间的关心、安慰和鼓励感我甚深，我将它们珍存心中。十七年后，我把叔叔信里鼓励的话语和几位前辈的教诲，一起敬放在我的新书《难得纯真》的封底，它们是激励我前行的力量。

又过了十年。为了清晰地了解父亲1942年的作品，尤其是《泥土的歌》出版后文坛的各种反响和评价，我思忖犹豫再三，终于开口向涉猎广泛、资料丰富的德明叔叔求援。因为，我的双亲在世时，凡是遇到书籍报刊和各种资料方面的疑难与问题，总会向德明叔叔求教，也曾借用过他的藏品，然后完璧归赵。

2011年2月20日，德明叔叔不仅在来信中夸奖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不能遗忘的精神接力》“内容丰实，也有感情”，而且回答了我的问题。几天后，他又寄来了信中提到的、父亲的老友徐中玉先生《评臧克家的小说〈挂红〉与〈拥抱〉》一文的复印件，而且邮了两次。原来，他亲自到复印店复印了此文寄出后，发现文章末尾没有印全，就再一次冒着冬日的严寒弥补了这个缺憾。我手捧着这沉甸甸的纸张，心里百感交集又无比懊悔，责备自己不应去麻烦这位有求必应的长辈。当时叔叔已届82岁高龄，我应该想到这位耄耋老者寻找资料的艰难，尤其是叔叔去世后，我在一些视频中看到他家层层堆积着的厚重的书刊，这种自责的心情更是挥之不去，然痛悔已晚……

姜德明叔叔是个重感情的人。在惊闻他远行之时，我不由得想到了曾读过的两封信。1994年去美国探望姜旗全家前，他曾专门来信说：“年尾将至，今年不能呈贺卡，也不能来府上祝贺春节了。月底，我与老伴儿赴美探亲，明年夏天回，届时再来问候。”而在1981年1月14日的信尾，叔叔满怀情感地写道：“又到了快写春联的时候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府上的一双大门……”我的泪水涔涔落下……

如今，叔叔的生命之门关闭了，然而，我记忆大门中姜德明叔叔的形象却那样丰满、鲜活，带着亲切的微笑。尽管巨大的悲痛侵袭着我，但我知道，叔叔并未远行，他，就在我的眼前和心中。

2024年3月

笔会

无题

（1965年 陈琦藏）

斋藤清

选自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版画·丝路——2024上海国际版画展”